周作人与《每周评论》

杨宏雨，潘蕊彤

（复旦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1917 年至 1919 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任教，与《新青年》同人建立密切联系，并成为该刊的重要供稿人。基于这一关系，他受邀参与《每周评论》的创刊及撰述工作。周作人不仅见证了《每周评论》从创刊到被查封的兴衰历程，还在其供稿过程中阐述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理论主张。他强调文学应紧密联系现实，发挥启蒙思想、推动社会变革的作用，以此回应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需求。通过《每周评论》这一平台，周作人不仅深化了自身的文学理论，也为社会变革与文化启蒙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周作人；《每周评论》；新文化运动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5-0078-12

收稿日期：2025-07-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2BDJ034）：《每周评论》研究。

作者简介：杨宏雨（1965-），男，江苏淮安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学博士；
潘蕊彤（2002-），女，四川乐山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5.010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开拓者与理论先驱，在文学理论建构、散文创作及新诗探索等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他提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理论主张，对现代文学创作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每周评论》作为五四时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综合性刊物，虽以时政评论闻名，但其在新文学推广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周作人阐发其文学理念的重要平台之一。考察周作人与《每周评论》的互动关系，对于深入理解其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以及创作实践的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①

本文以周作人与《每周评论》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 1917 年后周作人执教北京大学并深度参与新文化运动这一时期的思想嬗变，通过梳理周作人依托《新青年》同人的学术网络参与《每周评论》创办并持续供稿的历史脉络，深入探讨其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作品如何反映并推动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进而助力新文学运动与社会文化革新的过程。

一、走进《新青年》：成为《每周评论》创办人与撰述者

《每周评论》的创刊与《新青年》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而周作人与《每周评论》的渊源，也始于其与《新青年》同人的交往。

1915 年 9 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1916 年 9 月第 2 卷起更名为《新青年》）。在办刊实践中，该刊始终高举“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的旗帜，致力于新文化、新道德的倡导与旧文化、旧伦理的批判，在推动国民思想解放、社会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引领作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

作为《新青年》的核心人物，陈独秀虽在创刊之初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②，但其革命家的身份特质与启蒙动员的使命感，使其难以长期回避政治议题。1917 年 4 月美国参战这一国际局势的变动，特别是

①学界关于《每周评论》编者与作者研究，主要集中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核心人物，个别学者专文讨论了高一涵、王光祈与《每周评论》的关系，但目前尚未有人专文探讨周作人与《每周评论》的深层关联。目前学界对《每周评论》的研究状况，可参阅杨宏雨：《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每周评论〉研究的突破》，《决策与信息》2025 年第 3 期。

②陈独秀：《答王庸工（国体）》，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 1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167 页。

威尔逊主义所倡导的国际新秩序理念，对陈独秀的政治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1918 年 11 月一战结束后，陈独秀对“公理战胜强权”的信念进一步增强，他试图借助自己在新文化运动中积累起的思想影响力，给中国现实的政治以批评和建议——在国际上通过国际公理来维护中国的独立地位，不许各强国“拿强权来侵害”，在国内建立法治社会，不许“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①

然而，《新青年》作为综合性文化月刊的定位与体例，在及时回应时政议题方面存在明显局限。为弥补这一不足，陈独秀等人决定创办一种“发刊更迅速，刊期更短，与现实更直接”② 的介于报纸与杂志之间的刊物。1918 年 12 月 22 日，即一战结束 41 天后，《每周评论》应运而生。在陈独秀的统筹下，《每周评论》与《新青年》形成了功能互补的协同关系：前者侧重时政评论与社会批判，后者着重思想启蒙与文化革新，二者都是五四时期思想文化变革的开路先锋。

就周作人而言，尽管他后来作为《新青年》重要撰稿人的身份广为人知，但他并非该刊初创时期的核心成员，而是在新文化运动逐步展开的过程中加入同人圈的。周作人对《新青年》的态度经历了从最初的观望，到逐步认同，最终发展为积极参与的转变。通过《新青年》，周作人逐步确立了自己在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地位。这一过程也使周作人与《新青年》同人建立了密切联系，为其后来参与《每周评论》的创办与撰稿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新青年》仍以《青年杂志》之名出版时，周作人仅将其视为一本“普通的刊物”。这一时期，尽管陈独秀、胡适等人已开始激烈批评旧传统、倡导新思想，并介绍国外流行思潮，但周作人此时仍旧喜欢用文言写作，对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倡的“文学革命”并不感兴趣，还揶揄道：“说也可笑，自己（指陈独秀——引者）所写的文章都还没有用白话”。③ 1917 年 1 月 24 日晚，在阅览了鲁迅寄来的 10 本《新青年》（应为《青年杂志》6 本，《新青年》4 本）后，周作人仅淡淡地评价道“多可读”。④

周作人对《新青年》态度的转折出现在其北上任职北京大学期间。在鲁迅的引荐下，1917 年 3 月，周作人由绍兴前往北京，并于北京大学取得教职，这使他与《新青年》同人有了初步交往，也为其后续为《新青年》供稿提供了契机。蔡元培本拟安排周作人教授语言学和美学，但周作人“言此二学，均非所能，略无心得，实不足教人”，婉辞了这一提议。⑤ 由于学期中间无法新增课程，蔡元培改邀他担任预科国文教师。然而，周作人对此安排不甚满意，认为国文一科亦非其所长。⑥ 1917 年 4 月 10 日，周作人前往拜访蔡元培，欲辞去教授国文之职，并计划南归。当日，他初次见到了《新青年》的重要班底陈独秀和沈尹默二人。陈、沈二人竭力挽留其担任国文教师。⑦ 经过商议，4 月中旬，周作人暂时在北大附设的国史编纂处任职，负责收集英文资料。⑧

1917 年 7 月 1 日，中国政局发生剧变，张勋、康有为拥立溥仪复辟。为躲避政变引起的动荡，周作人与鲁迅一同移居崇文门内船板胡同的新华旅馆。⑨ 尽管仅仅 12 天后，段祺瑞攻进北京城，张勋兵败，溥仪再次宣告退位，复辟闹剧匆匆收场，但这一事件对周作人产生了巨大的触动。他将其视为“很不幸的事情”，但同时也认为“也可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这次事变促使他改变了以往对时事的冷漠态度，转而认识到“中国改革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⑩ 这种认识的转变直接推动了周作人对文学改良的重视，他意识到，参与文学改良是进行思想革命时“联带的应当做到的事”，由此积极投身于白话文创作实践。⑪

---

①只眼：《发刊词》，《每周评论》第 1 号，1918 年 12 月 22 日。

②张申府：《五四运动的今昔——有关五四运动的零感散忆之一》，《新文学史料》1979 年第 3 期。

③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 年，第 333 页。

④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19 页。

⑤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资料》第 2 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 年，第 52 页。

⑥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21 页。

⑦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21-122 页。

⑧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22 页。

⑨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23 页。

⑩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 年，第 319 页。

⑪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 年，第 334 页。

1917 年 9 月，周作人获得了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任国史编纂处编辑员的职位，在北京安顿下来。[①] 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在文学领域掀起巨浪：1917 年 1 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率先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2 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揭橥“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指明了“文学革命”的方向。在此背景下，钱玄同作为《新青年》的积极支持者，深受陈独秀、胡适等人思想的影响，致力于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②]

钱玄同与周氏兄弟的密切交往是周作人转变对《新青年》态度的重要因素。钱玄同高度评价周氏兄弟的思想，认为其“国内数一数二”。[③] 自 1917 年 8 月 9 日起，钱玄同频繁拜访周氏兄弟，极力劝说他们向《新青年》投稿，以期将其纳入新文化运动的阵营。自此，周作人愈发关心《新青年》杂志，乃至逐册阅览了后续出版的《新青年》。这在其日记中可见一斑：8 月 3 日，写到“买《新青年》三之二、三各一册”并在“下午阅《新青年》”[④]；8 月 14 日，又“往街买《新青年》三之四”[⑤]；9 月 3 日，更是在饮酒沉醉后“阅《新青年》”[⑥]；10 月 6 日，又阅《新青年》三之六。[⑦] 多次主动购买、阅读表明，周作人已逐渐接受了《新青年》的思想主张。

在钱玄同的推动下，周氏兄弟开始向《新青年》投稿。1918 年 1 月 15 日，《新青年》第 4 卷第 1 号正式改用白话文，周作人在该期发表了翻译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小说》。同年 5 月 15 日，鲁迅在第 4 卷第 5 号上发表了《狂人日记》，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白话小说的先河。此后，周氏兄弟持续为《新青年》供稿，成为该杂志的重要作者。仅周作人，在 1918—1919 年间，就以“周作人”“作人”“鲁迅”“迅”[⑧]“仲密”“启明”等多个署名，在《新青年》杂志上共计发表了四十余篇文章，涵盖翻译、评论、诗歌等多种文体。

随着周作人成为《新青年》的供稿人，他与杂志同人的交往日益密切，逐渐跻身《新青年》运营中心。1918 年 2 月 1 日，《北京大学日刊》发布《北京大学征集歌谣简章》，周作人与刘半农、沈尹默共同负责编辑工作，钱玄同与沈兼士则负责方言考订。[⑨] 同年 2 月 10 日，周作人又与鲁迅、刘半农等人聚会，商讨在《新青年》上开设新文艺专栏的计划。[⑩] 3 月至 4 月间，周作人连续在《新青年》上发表译作《皇帝之公园》《童子 Lin 之奇迹》及讲演稿《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⑪] 5 月 20 日，他专程拜访陈独秀。[⑫] 在返乡省亲回到北京后，周作人又继续向《新青年》多次投稿。

《每周评论》作为《新青年》的姊妹刊物，在创刊初期不仅在思想导向上与《新青年》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而且在编辑班底上也存在显著重合。由于与《新青年》的密切关系，周作人受邀成为《每周评论》的创办者之一，并积极参与了刊物的撰稿工作。

关于《每周评论》的创刊，周作人在日记中有明确记载：“（十一月）廿七日，晴。上午往校，得傅斯年君函，即答。下午至学长室议创刊《每周评论》，十二月十四日出板，任月助刊资三元。”[⑬] 周作人不仅参与了创刊筹备会议，还承担了每月三元的经济支持。日记确证了其在《每周评论》创办过程中的重要角色。

---

①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25 页。

②钱玄同：《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林文光选编：《钱玄同文选》，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 年，第 120 页。

③钱玄同：《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林文光选编：《钱玄同文选》，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0 年，第 121 页。

④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上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年，第 685 页。

⑤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上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年，第 687 页。

⑥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上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年，第 692 页。

⑦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上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年，第 699 页。

⑧《新青年》第 5 卷第 5 号、第 6 卷第 1 号上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的《随感录》三十七、四十二、四十三；《新青年》第 5 卷第 5 号以“迅”为笔名发表的《随感录》三十八实际作者均为周作人。参见张菊香：《鲁迅周作人早期作品署名互用问题考订》，《鲁迅研究月刊》2002 年第 6 期。

⑨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29 页。

⑩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30 页。

⑪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30-131 页。

⑫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32 页。

⑬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上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年，第 786-787 页。

二、见证兴衰:周作人与《每周评论》关系始末

尽管周作人在《每周评论》上正式发表的首篇文章是刊登于第4号的《论“黑幕”》,但他无疑是该刊的“元老”成员之一,见证了《每周评论》的兴衰。

关于《每周评论》的初创过程,周作人在其回忆录中提及,创刊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不仅原定于1918年12月14日出版的创刊号推迟至12月21日才得以印刷,而且创刊号的印刷质量也“很不整齐”。[①] 到底怎么不整齐,周作人没有明说,笔者把创刊号和后来的各号相比对发现,首先是《每周评论》的英译“The Weekly Review”漏掉了“The”;其次是排在《发刊词》后面的“本报简章”和“列左”排列在一排,字体、字号一样,且没有必要的空行,容易让读者误会成标题是“本报简章列左”;再次是第一版和第四版的文字,有的紧凑,有的疏阔。

周作人积极参与了《每周评论》的撰述工作。1918年12月10日,他将自己撰写的《人的文学》一文交付陈独秀,希望在《每周评论》创刊号上刊登。[②] 然而,至12月15日,他收到陈独秀的回信,信中说该文“以载月刊为宜,拟登入《新青年》”。[③] 同时,陈独秀还希望周作人就“文艺时评”一栏写作“实物批评之文”。接此信后,周作人迅速完成了《论“黑幕”》与《平民的文学》两篇文章,并先后发表于《每周评论》第4号和第5号。[④]

周作人对《每周评论》的爱不仅限于撰稿,他还积极推广这份刊物。该刊第1号出版后,他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样张,并向家人、友人分享这一新生的杂志。据《周作人日记》记载,12月23日,他在前往学校向陈独秀寄稿时获得了六份最新出版的《每周评论》;[⑤] 12月24日,向友人张梓生[⑥] 寄信时随函附上一张《每周评论》;[⑦] 12月26日,寄家信时又附上一张《每周评论》;[⑧] 12月30日,收到第2号《每周评论》后,又随信寄给张梓生一份;[⑨] 12月31日,寄家信时,他又“附银百元、《每周评论》一张”,下午收到《每周评论》社的信函后,他的反应是“即答”。[⑩]

此后,他连续为《每周评论》撰写了多篇文章。他后来回忆,在这些文章中,印象最深的是《祖先崇拜》与《思想革命》。他视之为“由衷之言”,趋近于“言志”。[⑪] 前者一反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主张废止祖先崇拜而改为子孙崇拜;后者则提出“思想革命”这一口号,主张文学应该承载新的思想内容,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觉醒。

1919年4月,周作人请假离开北京,返回绍兴,随后前往东京,暂时中断了与《每周评论》的联系。待他返回北京时,已是5月18日,因此未能亲眼目睹5月4日爆发的学生运动。[⑫] “五四运动”如燎原之火,迅速点燃了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然而,北洋政府并未因势利导,设法积极平息社会的不满,反而试图通过高压手段取缔学生活动。6月3日,北京再次爆发大规模学生抗议活动。据匡互生记载,当天“同

---

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年,第355页

②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上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789页。

③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中记载的时间为14日,但周作人日记记载是12月15日“得独秀函”,故应是15日。

④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年,第377页。

⑤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上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792页。

⑥张梓生,字君朔。浙江绍兴人。于绍兴山会师范毕业后,在原籍小学和女校任教。后任《东方杂志》编辑、《申报年鉴》主编兼《申报》社评记者。1934年5月接替黎烈文编辑《申报·自由谈》,与周作人、鲁迅交往甚多。

⑦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上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793页。

⑧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上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793页。

⑨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上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794页。

⑩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上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794页。

⑪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年,第378页。

⑫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中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27页。

时被捕的有四十七人之多”，甚至北大法科院舍也被用作“临时的监狱”。[①] 政府大规模出动军警逮捕学生，企图以武力阻止抗议活动，但这一举措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周作人见证了6月3日事件，深受触动，并借助《每周评论》抒发其所闻所感。据其回忆，6月3日当天，他听闻政府拘留了许多中小学生，便与陈百年、刘半农、王星拱一起以“北大教员代表”的身份，前往最近的拘留处——北大第三院法科慰问被捕学生。然而，他们的要求被警卫断然拒绝，“只在门前站着看了一会儿”。在此期间，不断有学生被军警押送来，而对于这些被押送的学生，“在门楼上的一些同学，便拍手高呼欢迎他们，那些看热闹的人也拍手相应”。他对此颇为同情，并感慨道：“反动政府对于革命运动的无理镇压，不但给予革命者本身，也给予一般民众以最好的训练，使得他们了解并同情革命，往往比运动本身更有效力”。[②]

6月4日，形势仍未平息。6月5日，周作人步行至前门内警察厅门前，路遇学生演讲，军警包围演讲者和民众，并派马队冲散人群。此时一老翁勃然大怒，责问：“我们平民为什么路都不能走”，并试图以命与马队对抗。[③] 这一场景给周作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晚，他撰写了《前门遇马队记》，并于次日上午交给陈独秀，请其编入《每周评论》。该文随后发表于该刊第25号。虽然周作人对这篇文章评价不高，认为“写得并不怎么精彩”，仅是“装痴假呆地说些讽刺话”，但由于其尖锐的讽刺引起了警察厅的注意，达到了使“骑在马上的人也隔衣觉着针刺”的效果，这令他感到满意。[④]

1919年6月8日出版的第25号成为《每周评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分界线。6月11日，陈独秀因到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直到9月16日才被释放。[⑤] 陈独秀被捕后，《每周评论》以杜威在华的讲演应付了两期后，由胡适继任主编。这一事件在周作人的日记中也有所反映。6月23日，周作人记载：“下午七时回寓，适之招饮，同席十二人，共议《每周评论》事，十时散。”[⑥]

周作人后来回忆称，这次商议的结果也只是维持现状，欲以李大钊与胡适共任编辑。但李、胡二人观点差异甚大，合作难以实现。此后，“生气虎虎的《每周评论》已经成了强弩之末”。[⑦] 但需要指出的是，《知堂回忆录》写于20世纪60年代，此前胡适在大陆遭到批判，其与李大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已成为广为人知的“公案”。因此，周作人回忆录中对《每周评论》后期不佳的印象可能受到了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不一定准确、可靠。

仅一个多月后，《每周评论》便迎来了它的终结。1919年8月24日，《每周评论》第36号出版。8月30日，北京政府下令禁封《每周评论》。周作人于《每周评论》上的发表生涯也截止于7月20日刊登在该刊第31号上的译作《人生的礼物》。

1919年9月16日，陈独秀在多方力量的营救下出狱。尽管陈独秀出狱后无力重启《每周评论》，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编辑与出版工作仍在继续。10月5日，周作人又至胡适寓所，与众人商议《新青年》未来相关事宜，最后议定，“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⑧]《每周评论》终刊后，周作人在20世纪20年代继续在《新青年》《语丝》《晨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等进步刊物上发表作品，助推“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骁将”。[⑨]

---

①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

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年，第379-380页。

③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年，第380页。

④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年，第382页

⑤王克昌：《陈独秀第二次被捕细节考证》，《北京党史》2012年第6期。

⑥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中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34页。

⑦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年，第356-357页。

⑧周作人：《周作人日记》中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52页。

⑨倪墨炎：《自序》，《苦雨斋主人周作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页。

三、供稿《每周评论》:在思想上走向“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心

在《每周评论》存续的八个月期间，周作人以“仲密”为笔名在该刊共计发表 12 篇作品（见表 1）。“仲密”是周作人一生多个笔名之一。据他解释，“仲密”的“密”是因为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时说，“周字从用口，训作‘密也’”，而“仲”则意指其在家中排行第二。①

从发文数量来看，周作人在《每周评论》的署名作者中位列第六（前五位是陈独秀、高一涵、李大钊、胡适、张申府）。周作人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文章大多属于文艺领域，其中议论性质文章 7 篇，诗歌 3 篇，译文 2 篇，分别发表于“文艺时评”（4 篇）、“新文艺”（6 篇）和“社论”（2 篇）三个栏目。

表 1　周作人于《每周评论》发表信息汇总

发表时间	标题	期刊数	体裁、栏目及另载信息
1919 年 1 月 12 日	论“黑幕”	第 4 号	栏目:文艺时评;另载《新青年》第 6 卷第 2 号。
1919 年 1 月 19 日	平民文学	第 5 号	栏目:文艺时评。
1919 年 2 月 2 日	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	第 7 号	栏目:文艺时评。
1919 年 2 月 9 日	杀儿的母	第 8 号	栏目:文艺时评。
1919 年 2 月 23 日	祖先崇拜	第 10 号	栏目:社论。
1919 年 3 月 2 日	思想革命	第 11 号	栏目:社论;另载《新青年》6 卷第 4 号。
1919 年 3 月 16 日	背枪的人	第 13 号	诗歌; 栏目:新文艺;另载 5 月《新潮》第 1 卷第 5 号。
1919 年 4 月 13 日	京奉车中	第 17 号	诗歌; 栏目:新文艺;另载 5 月《新潮》第 1 卷第 5 号。
1919 年 6 月 8 日	前门遇马队记	第 25 号	栏目:新文艺。
1919 年 6 月 8 日	偶成	第 25 号	诗歌; 栏目:新文艺。
1919 年 6 月 29 日	欢乐的花园	第 28 号	译文; 栏目:新文艺;作者:(南非) 须莱纳夫人。
1919 年 7 月 20 日	人生的礼物	第 31 号	译文; 栏目:新文艺;作者:(南非) 须莱纳夫人。

关于周作人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中的角色，他曾在其回忆录中谦逊地表示，自己在两刊中仅扮演“客员”角色，主要负责日常撰稿工作，仅在刊物面临存续危机时才会受邀参与编辑会议，几乎不参与最终的编辑与决策过程。② 在向《每周评论》供稿同时，他在《新青年》上以“周作人”“仲密”“起明”“鲁迅”等名共发表文章 20 篇左右（见表 2）。从发文数量来看，周作人在两刊的发文量基本持平;就内容取向与题材而言，其发表的文章在题材与风格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涵盖诗歌创作、作品翻译、文学评论与社会批评等多个领域。

此外，周作人在《每周评论》发表的部分文章还在多刊同时刊登，形成了“跨刊传播”现象。其中，《论“黑幕”》和《思想革命》两篇文章同时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刊登。《背枪的人》和《京奉车中》两首诗被转载于《新潮》第 1 卷第 5 号，并附有傅斯年的编者按语：“我们应该制造主义和艺术一贯的诗，不宜常常在新体裁里放进旧灵魂……所以现在把《每周评论》里的这两首诗选入，作个榜样。”③ 跨刊传播不仅扩大了周作人文章的传播范围，也为周作人及其思想主张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关注。

---

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 年，第 143 页。

②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 年，第 357 页。

③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144 页。

表 2　周作人同时期《新青年》发表信息汇总①

笔名	发表时间	标题	期数	其他信息
周作人	1918 年 12 月 15 日	文学改良与孔教——答张寿朋	5 卷 6 号	“通信”栏
		小小的一个人		译文。作者：（日本）江马修
		人的文学		本为《每周评论》投稿，因陈独秀调整改发《新青年》
鲁迅	1919 年 1 月 15 日	随感录四十二	6 卷 1 号	
		随感录四十三		
周作人		铁圈		译文。作者：（俄国）F. Sologub
		卖火柴的女儿		译文。作者：（丹麦）H. C. Andersen
仲密	1919 年 2 月 15 日	论“黑幕”	6 卷 2 号	
		再论“黑幕”		
周作人		英文 She 字译法之商榷		合著：钱玄同
		小河		诗歌
		可爱的人		译文。作者：（俄国）Anton Tshekhov
周作人	1919 年 3 月 15 日	日本的新村	6 卷 3 号	
		两个扫雪的人		诗歌
		路上所见		
		微明		
		北风		
仲密	1919 年 4 月 5 日	思想革命	6 卷 4 号	
周作人		答蓝志先君		“讨论”栏
起明	1919 年 4 月 15 日起	俄国革命之哲学的基础	6 卷 4、5 号	译文，作者：（英国）Angelo S. Rappoport

通过对周作人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作品进行考察，我们可以观察到其文学观念的重要特征——文学与现实紧密关联。周作人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实践突破了传统文学观念中将文学与审美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理念，导致对美的追求胜过内容、束缚内容的倾向，转而将文学定位为社会变革与文化启蒙的重要工具。

胡适在回顾新文学运动的理论建构时，将其核心纲领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活的文学”，即文学形式的革新，主要体现为语言工具的现代化；二是“人的文学”，即文学内容的革新，强调文学应以人性为核心，关注人的价值与尊严。② 他高度评价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称其为“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③ 由此可见，周作人《人的文学》一文及其所提出的“人的文学”观念在新文化运动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鉴于《人的文学》一文从拟投稿《每周评论》到最终发表于《新青年》的特殊历程，以及其在周作人思想发展中的关键地位，在研究周作人于《每周评论》中所呈现的思想脉络时，有必要首先对该文进行深入考察与分析。

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开篇即明确提出：“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他进一步阐释道，“人的文学”中的“人”是指“从动物进化的人类”。这一概念包含两个核心要点：其一，人是“‘从动物’进化的”，其二，人是“从动物‘进化’的”。基于前者，周作人强调“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

①根据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与钟叔河编订的《周作人散文全集》整理而成。

②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24 页。

③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136 页。

该排斥改正。”基于后者，他指出“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凡兽性的馀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把这两个要点结合起来得到的结论是：“人类正当的生活”应是“灵肉一致的生活”。①

这种“灵肉一致的生活”在物质层面表现为“各人以心力的劳作，换得适当的衣食住与医药，能保持健康的生存”；在道德层面则体现为“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周作人将这种生活称为“‘人的’理想生活”，认为其本质是“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并强调其实践“实于世上的人无一不利”，是一种真正符合人道主义的生活。②

周作人特别指出，他所提倡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强调“从个人做起”，将自我视为根本与关键。他以森林与树木的关系作比喻：“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因此，“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③

周作人将“人的文学”定义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他认为“人的文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正面的”，即描写灵肉一致的“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另一类是“侧面的”，即描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材料方法，别无关系。”基于这一标准，周作人对中国古代九类文学作品（色情狂的淫书、迷信的鬼神书、神仙书、妖怪书、奴隶书、强盗书、才子佳人书、下等谐谑书和黑幕类书）进行了批判，认为它们“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④

周作人进一步指出，“人的文学”中的人必须是现实的人，因此文学必须反映现实。他强调：“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又将批评与主张，分作两事。批评古人的著作，便认定他们的时代，给他一个正直的评价，相应的位置。至于宣传我们的主张，也认定我们的时代，不能与相反的意见通融让步，唯有排斥的一条方法。”在推进“人的文学”发展的具体方式上，周作人提出了两点主张：一是注重作品的思想道理，“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凡是合理的思想，都应该接纳、吸收、继承；二是作品应符合时代要求，“对于中外这个问题，我们也只须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不必再划出什么别的界限。”针对当时中国的现状，他特别强调需要“介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视野”，使他们能看到世界，看到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⑤《人的文学》一文所阐发的理念，生动地体现在周作人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实践中。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与胡适的“活的文学”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胡适提出的文学改良主张中“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⑥“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⑦，已含有建设符合时代要求的个人主义文学的精神，而周作人则把这一精神更加明确化了。“人的文学”肯定了人性，肯定了人类一切正当生活的合理性，主张以文学来发展和完善人性，这是周作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大贡献。

《平民文学》一文延续并深化了《人的文学》的核心精神，进一步将周作人所倡导的文学服务对象具体化。在该文中，周作人明确提出文学的发展方向应趋向平民化。他指出，“中国现在成了民国，大家都是公民”，贵族与平民的界限已然消弭，文学理应为这一新时代服务，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实现平民化。尽管周作人认同平民文学是对贵族文学的反拨，但他同时强调，“我们说贵族的平民的，并非说这种文学是专做给贵族或平民看，专讲贵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贵族或平民自己做的。不过说文学的精神的区别，指他普遍

---

①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

②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

③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

④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

⑤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

⑥胡适：《寄独秀》，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⑦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页。

与否，真挚与否”。①

周作人将平民文学的精神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普遍”，即“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记录“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其二是“真挚”，即“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既不坐在上面，自命为才子佳人，又不立在下风，颂扬英雄豪杰。”而关于如何建设平民文学，周作人特别提醒要避免两种误解：其一，将平民文学简单地等同于通俗文学。他澄清道，“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白话的平民文学比古文原是更为通俗，但并非单以通俗为唯一之目的。因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要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其二，将平民文学误解为慈善主义的文学。“平民文学决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在现在平民时代，所有的人都只应守着自立与互助两种道德，没有什么叫慈善……平民文学所说，是在研究全体的人的生活，如何能够改进，到正当的方向，决不是说施粥施棉衣的事……伪善的慈善主义根本里全藏着傲慢与私利，与平民文学的精神绝对不能相容，所以也非排除不可。”②《平民文学》是对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提出的三大主义——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③ ——的有机承接与辩证思考。

《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两文集中体现了周作人在此时期的文学思想内核。他呼吁文学应摒弃封建礼教与贵族文学的高高在上，转而聚焦于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文学应具有普遍性与真挚性，以“普通的文体”记录“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并以“真挚的文体”表达真实的思想与情感。同时，他倡导“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强调从个体出发，尊重并提升人的价值，认为个人的发展与人类的进步密不可分。此外，周作人特别注重文学的时代性与现实性，主张文学应反映时代需求，批判阻碍人性发展的旧制度与旧文化。这些思想不仅构成了此时期周作人文学理论的核心，也为其在《每周评论》中的文学实践与文化批评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每周评论》发表的文章中，周作人以这一思想为指导，展开了多形式的批评实践。在《每周评论》第4号中发表的《论“黑幕”》一文中，他延续了《人的文学》中对黑幕类书籍的批判立场，深入剖析了“黑幕小说”盛行的社会根源。周作人指出，这些流行的“黑幕书籍”表面上打着揭露社会黑暗的旗号，实则内容低俗、夸张且缺乏系统性。他强调，真正的社会批判不应止步于表面的揭露，而应深入探讨人与社会的关系。他提出：“将黑幕里的人，和他所做的事，连着背景，并作一起观。……我们要看这中国民族在中国现在社会里，何以做出这类不长进的事来。”他希望能通过文学探索“中国人的根性怎样？他们怎样造成社会？又怎样被社会造成？总而言之，这中国人与社会能否长进？能否改好？能否存在？”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④ 这种对国民性与社会关系的关注，正是新文化启蒙思潮的重要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论“黑幕”》一文的写作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新文化倡导者们群体性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作人的批判与当时新文学阵营对黑幕小说的整体批判运动密切相关。袁世凯帝制复辟失败后，中国社会，尤其是新闻出版业兴盛的上海，涌现出一批以揭露北京官场腐败和帝制闹剧为内容的黑幕小说。这些小说在混乱的时局与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迅速风行，但其内容逐渐低劣化，对社会风气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⑤

黑幕小说的泛滥，引起了正在推进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们的极大关注。新文化阵营的知识分子对黑幕小说展开了集中批判。钱玄同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中发表《“黑幕”书》，指出黑幕书的泛滥源于洪宪帝制时期对言论的压制，导致一些文人转向创作旧式小说以谋生。他认为黑幕书是“淫书者之嫡系”，

---

①仲密：《平民文学》，《每周评论》第5号，1919年1月19日。

②仲密：《平民文学》，《每周评论》第5号，1919年1月19日。

③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

④仲密：《论“黑幕”》，《每周评论》第4号，1919年1月12日。

⑤蒋成浩、黄继刚：《袁氏复辟与黑幕奇观：民国初年黑幕小说的兴衰》，《文化研究》2022年第1辑。

对青年贻害无穷，并强调《新青年》作为革新青年思想的平台，有责任排斥此类书籍。[①] 罗家伦在《新潮》第1卷第1号中发表《今日中国之小说界》，痛斥“黑幕派”为中国小说界中“罪恶最深”的一派，批评其挑拨读者的罪恶欲望，助长社会不良风气。[②]

此次批判运动中，周作人不仅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论“黑幕”》，还应《新青年》之邀，撰写了《再论“黑幕”》，逐一驳斥杨亦曾为黑幕小说辩护的观点。他明确指出：“黑幕是一种中国国民精神的产物，很足为研究中国国民性社会情状变态心理者的资料，至于文学上的价值，却是‘不值一文钱’。”[③] 他认为黑幕小说在新文学中毫无地位，既无改良的必要，也无改良的可能。周作人等人的批判文章得到了主流文坛的认可，这场针对黑幕小说的批判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使黑幕小说被宣判了“死刑”。[④]

《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一文，既是周作人文学批评的重要范本，也是其借文学介入社会议题的思想文本，体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文学关怀与社会关怀的双重维度。在文中，他首先对“问题小说”与“教训小说”进行了学理性辨析，提出了文学应当关注社会现实与未来道德的主张。周作人指出，“教训小说”旨在通过小说形式传播既有的道德观念，要求读者被动接受；而“问题小说”则是通过文学形式提出社会问题，并积极探索解决方案，其核心价值在于探讨“尚未成立却不可不有的将来的道德”。周作人认为，“问题小说”是近代平民文学的产物，其价值在于关注“人生诸问题”，尤其是那些尚未被社会充分认识却亟待解决的道德与伦理议题。[⑤]

周作人批评了中国传统小说在处理男女关系问题上的简单化与理想化倾向——“那种抱非人思想的文豪，往往将这问题办一个团圆大喜，造成一部八美或十美缘，以后更无话可说”。他认为中国传统小说中，只有《红楼梦》在处理这一问题时表现出了独特的价值，堪称“中国问题小说的代表”。《红楼梦》不仅揭示了旧家庭和社会制度造成的婚姻悲剧，还深刻描写了家庭内部的复杂关系。因此，它尽管是一部古典作品，“在现在社会上，却仍有意义”。周作人还以西方文学作品为例，展现了域外小说在处理男女关系主题时的深度与多样性，进一步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学在这一领域的不足。[⑥] 通过这篇文章，周作人不仅批判了传统文学对社会问题的回避与简单化，还倡导了一种以个人自由、相互尊重和社会进步为核心的新文学观念。

周作人还在其文章中直接对某些传统习俗与社会现实提出批判，强调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并呼吁改良落后的社会习俗。在《杀儿的母》一文中，周作人深入揭示了弃儿与杀儿现象背后的深层社会根源。通过对这一社会悲剧的分析，他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道德观念与经济制度的双重困境，而非简单的个人道德缺失。周作人强调，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道德观念和经济制度两方面进行系统性改革，而不能仅仅依赖表面的道德宣传或建立育婴堂等治标不治本的措施。[⑦] 而在《祖先崇拜》中，周作人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祖先崇拜”习俗。他直言“祖先崇拜”是“部落时代的蛮风”，并对其在现代社会中延续的合理性表示质疑。周作人指出，当前社会的目标应是“前进”，过度沉溺于对过去的崇拜只会阻碍社会进步。他提出应以“自己崇拜”和“子孙崇拜”取代“祖先崇拜”，重视个体价值与未来发展的意义，而非一味地回顾与固守传统。[⑧]

周作人并未将“文学革命”视为其创作的终极目标。他认为“仅仅‘文学革命’是远远不够的”，更希望通过文学的力量引发国人的“思想革命”。在《思想革命》一文中，周作人系统阐述了他的思想革命主张。他肯定了文学革命在文字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但随即指出，仅靠文字形式的改良无法彻底解决根本问题。周作人强调，文学是思想与文字的结合体，“表现思想的文字不良，固然足以阻碍文学的发达”，但如

---

①宋云彬、钱玄同：《“黑幕”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②志希：《今日中国之小说界》，《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

③仲密：《再论“黑幕”》，《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

④范伯群：《黑幕征答·黑幕小说·揭黑运动》，《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⑤仲密：《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每周评论》第7号，1919年2月2日。

⑥仲密：《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每周评论》第7号，1919年2月2日。

⑦仲密：《杀儿的母》，《每周评论》第8号，1919年2月9日。

⑧仲密：《祖先崇拜》，《每周评论》第10号，1919年2月23日。

果思想本身存在问题，即便文字表达形式得到改进，也难以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学。因此，他提出，思想革新是文学革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甚至比文字改革更为重要。只有在思想层面实现彻底变革，文学革命才能真正达成其最终目标——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①

在《每周评论》中，周作人不仅通过文学作品和文化批判表达思想，还借助对现实事件的记述，直接呈现其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与态度。如前文所述，《前门遇马队记》一文记录了周作人于1919年6月5日在警察厅附近的亲身经历。文中详细描述了“我”偶然目睹的一场军警与民众之间的冲突场景：当“我”经过警察厅时，发现街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群众，马路中央则站满了军警，几队身着长衫的青年手持国旗，被军警团团包围。正当“我”准备离开时，马队突然发生意外——在对峙的紧张氛围中，有人不慎撞到马匹，导致马匹失控。随后，“大家发了慌，一齐向北狂奔，后面还听得一阵马蹄声和怪叫”，“我”也迅速离开现场。

尽管事件本身看似琐碎，但“我”在事后进行了深刻反思：“马是无知的畜生，它自然直冲过来，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但马背上的人却是有思想、有主见的，却任由马匹践踏“我们自己的人”。“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境下，“理应不要逃走”，而应与马上的“人”进行对话。此外，“我”还对比了自身在国外的经历：“从前在外国走路，也不曾受过兵警的呵斥驱逐，至于性命交关的追赶，更是没有遇着”，而在本国的首都却遭遇如此惊吓，实属“出人意表之外”，因此不免“大惊小怪，写了许多话”。然而，“我”并不后悔此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诲与觉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② 通过写实的手法，这篇文章隐晦地表达了周作人对北京军阀政府的不满，同时也借“我”的反思，呼吁民众在面对压迫时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这种以个人经历为切入点，结合社会批判与思想启蒙的纪实写作，不仅展现了周作人对社会现实的敏锐观察，也体现了其通过文学介入社会、推动变革的自觉意识。

在《每周评论》上，除了议论性文章外，周作人还发表了3首白话文新诗，并翻译了2篇席莱纳的文学作品。这些创作实践不仅丰富了其文学表达形式，更深刻反映了他此时期的文学思想内核。

《背枪的人》《京奉车中》和《偶成》三首诗分别描绘了不同的社会场景与人物形象，均围绕普通人生活展开，体现了周作人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观察与人文关怀。《背枪的人》描写了在清晨“行人稀少，店铺多还关闭”时站岗的一位背枪士兵。对于这位士兵，文中主人公心情复杂，本“怕见恶很很的兵器”，另一方面又因此人“指点道路，维持秩序，只做大家公共的事”，转而感到亲近，称之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兄弟”。③《京奉车中》则通过逃票士兵的形象，展现了更为复杂的社会现实。诗中士兵“臃肿的军衣”和“悠然的吸烟卷”的细节描写，既揭示了底层军人的生活困境，又暗示了其道德困境。周作人以“理性教我恕你爱你”，但“感情还不容我真心的爱你”的矛盾态度，表达了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深刻思考，最后“我的力量还没有彻底”，折射出知识分子无力解决社会问题时的遗憾。④ 而在《偶成》中，周作人则通过描写一位被捕少年的场景，进一步展现了周作人对平民的同情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诗的开篇以“灰色的大屋”“钟声消失”和“无人行迹”等意象，营造出压抑与不安的氛围。随后，“许多老老小小的人”却“都在隔河默望着”，反映了普通民众对社会事件的关注与无奈。被捕之人年纪“不过十二三”，但下场却是被关入监狱，“一眨眼间”“忽然不见了”。尽管文中并未体现这位少年所犯何事，但周作人以作者身份表达了对这位少年的敬意，并祝愿他“立志反对军国主义”“与我们同做平和的人民，过自由的日子”，体现了其鲜明的反战立场与人文关怀。⑤

尽管周作人的新诗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文学革命”与“白话诗运动”的形势所推动，带有“起模范带头作用”的意味。⑥ 但仅就《每周评论》上刊登的诗歌而言，这些作品在内容上均体现了周作人“平民文学”的核心主张，不仅以“普遍”的眼光反映了“平民生活——人的生活”，还“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

---

①仲密：《思想革命》，《每周评论》第11号，1919年3月2日。

②仲密：《前门遇马队记》，《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

③仲密：《背枪的人》，《每周评论》第13号，1919年3月16日。

④仲密：《京奉车中》，《每周评论》第17号，1919年4月13日。

⑤仲密：《偶成》，《每周评论》第25号，1919年6月8日。

⑥叶红：《论周作人早期诗学理念》，《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想与事实”，记录与评价了其笔下的主人翁。[①]

周作人对席莱纳（Olive Schreiner，周作人译作“须莱纳夫人”）作品的翻译实践，则充分体现了其在《人的文学》中提出的“介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视野”的文学主张。[②] 席莱纳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的女权主义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周作人对其十分仰慕。他先后在《欢乐的花园》（1919年）和《梦》（1923年）中对席莱纳的生平与思想进行了介绍，称其为“最进步的妇女经济论者之一”，并将其与美国女权运动先驱纪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相提并论。[③]

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译作中，周作人通过席莱纳的作品，揭示了女性在社会规范压迫下的困境，体现了妇女解放的思想。《欢乐的花园》运用象征手法，描绘了女性在“名分”压迫下的精神困境与抗争历程。作品中，“花”象征着女性的情感与自我价值，“名分”则以“沉静白色的脸”出现，代表社会规范的无形压迫。女性从最初的抗争到最终的妥协，其心路历程通过“花”的凋零和“灰色沙尘”的意象得到生动呈现，深刻揭示了传统社会规范对女性主体性的压制。[④] 另一篇译作《人生的礼物》则通过梦境的形式，探讨了女性在“恋爱”与“自由”之间的价值选择。作品通过寓言式的叙事，阐明了女性只有先追求自由，才能获得完整人生的深刻哲理。“人生”这一拟人化形象的出现及其对女性选择的肯定，不仅体现了席莱纳的女权思想，也反映了周作人对女性解放问题的思考。[⑤] 两篇译作在《每周评论》的发表，为中国读者提供了思考女性解放问题的新视角。通过译介席莱纳的作品，周作人将西方女权主义思想引入中国，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总之，周作人通过参与《新青年》并成为其同人之一，进而依托这一关系成为《每周评论》的创办者与主要撰稿人。他在《每周评论》上的投稿，始终秉持“人的文学”理念，强调文学应以“真挚”的态度记录与反映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同时主张文学应回应时代需求，批判旧制度、旧文化以及现实中的种种弊端，从而积极推动社会变革。周作人在《每周评论》时期的思想与实践，不仅深化了新文学的理论内涵，还通过具体的文学创作与社会批评，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注入了活力，成为新文学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

Zhou Zuoren and *The Weekly Review*

YANG Hong-yu, PAN Rui-tong

(School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From 1917 to 1919, Zhou Zuoren joined Peking University and established close ties with the contributors of *New Youth*, becoming a key writer for the journal. Based on this connection, he was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founding and writing of *The Weekly Review*. Zhou Zuoren not only witnesse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eekly Review* from its inception to its suppression but also articulated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such as “human literature” and “common people's literature” during his contributions. He emphasized that literature should be closely connected to reality, serving to enlighten minds and promote social change, thereby addressing the historical demands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Through the platform of *The Weekly Review*, Zhou Zuoren not only deepened his own literary theories but also provided significant intellectual resources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cultural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Zhou Zuoren; *The Weekly Review*; New Culture Movement

[责任编辑　唐音]

①仲密：《平民文学》，《每周评论》第5号，1919年1月19日。

②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

③周作人：《梦》，《晨报副镌》，1923年7月21日。

④[南非]须莱纳夫人著：《欢乐的花园》，仲密译，《每周评论》第28号，1919年6月29日。

⑤[南非]须莱纳夫人著：《人生的礼物》，仲密译，《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